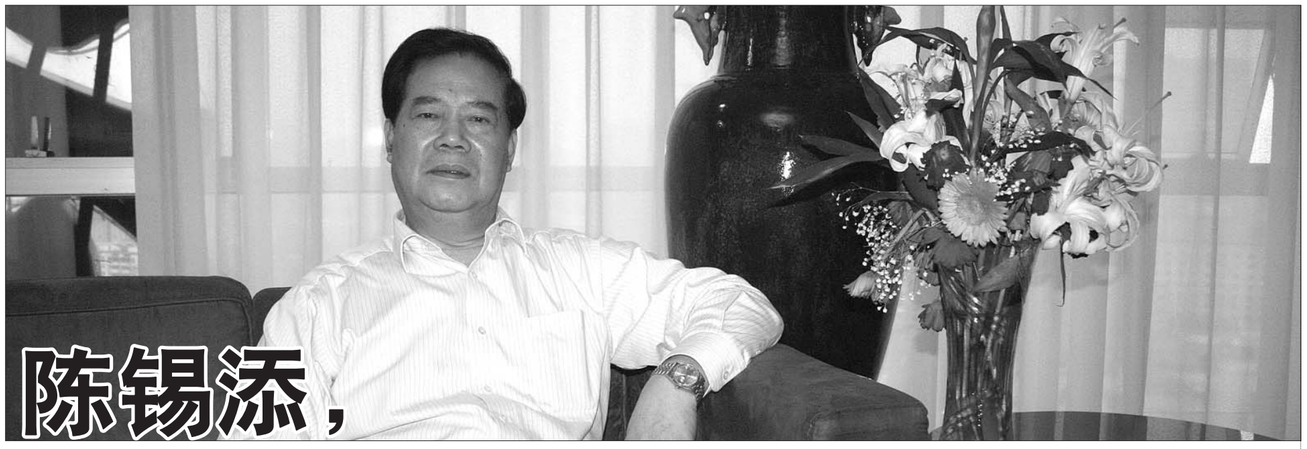

陈锡添，我知道风往哪个方向吹

文/片 本报记者 任鹏

我们一起追那些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20年风云人物

有一天，青春不再，却一事无成——很多人都曾经历过这样的困顿和失落。然后，有人选择从此起步，有人则甘于沉沦平淡。

当年，陈锡添也面临着这样的选择。

都说四十不惑。可年过四十的陈锡添才开始困惑：未来在哪里？理想究竟有多重要？

最终，42岁的陈锡添下定决心：放弃其他，遵从内心。就在那一年，他去了刚成立3年的深圳特区，成为一名“大龄记者”。

所以，当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时，机遇才会突然敲门，出现在陈锡添面前，陈锡添也有幸成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记录者，而陈锡添的人生，也因此改变。

直到现在，71岁的陈锡添仍掌《香港商报》总编辑之职，还经常和年轻记者一起探讨写作的细节。

3月30日，在河南郑州，陈锡添与本报记者一起回顾了他这20年的历程：比别人起步晚，却也比很多人走得更长。即使人生迟暮，在机遇找到你之前，你也需要做好准备。

一次冒险的发稿

当年发表时被称作具有“极大政治勇气”的《东方风来满眼春》，在20年后的2012年1月31日重新刊发在《深圳特区报》头版。

该文作者陈锡添和这篇文章，像是互为代名词，早已刻上了彼此的烙印。

3月30日，应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之邀，陈锡添来郑州参加《东方风来满眼春》发表20周年座谈会。

“必须承认，1992年改变了我的一生。”在郑州一宾馆内，面对本报记者，陈锡添点上一支烟，烟雾升腾，思绪回溯——

那是1992年1月18日，陈锡添接到一项重大任务：邓小平次日9点到深圳，跟随采访，此事绝密，不得外传。

“我是深圳唯一指派的文字记者。”

当这个机遇敲门时，陈锡添51岁，是《深圳特区报》副总编辑，到报社工作9年，经历坎坷，几多离合。这个年龄的人生，似已渐渐迟暮。

而当时的深圳特区，情势也颇为微妙。

“迈进90年代，敢闯敢试的深圳畏缩不前了。”陈锡添说，当时湖南的一位市委书记曾私下对他说，“大家都盯着深圳，深圳畏缩不前，改革开放的前景岂不很迷茫？”

当时，一场遍及全国的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愈演愈烈，有一个故事真实得让人难以想象：一位老革命家哭泣着说：“深圳只有国旗是红的，江山变色了。”

邓小平到了深圳，陈锡添得到的指令是“不报道”。

陈锡添觉得可惜。“光‘邓小平到深圳’这6个字就是全国重大新闻，尤其是在这种背景下，意义非同一般。”

在“不报道”的指令下，跟随而来的几家中央媒体记者都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写稿。

“直觉告诉我，总有一天会有机会报道，我要有这方面的准备。于是小平同志走到哪，我就拼命挤在旁边，要不然听不到他讲话。”从后来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陈锡添和邓小平中间往往只隔着三五个人。

采访不准录音，只能凭笔记，晚上回到宾馆，再凭要点回忆整理，凌晨两点之后才睡。

最后，5天的采访笔记记了70多页。

报社的摄影部主任曾让陈锡添带一台相机，拍几张照片，但被他拒绝了，理由是“一心不能二用”。

到3月中旬，媒体仍未获准公开发表小平讲话，这盏“红灯”谁也不敢去闯。

3月22日，陈锡添一觉醒来，看到《南方日报》头版标题是“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他感觉“脑袋‘轰’的一下炸开，大口喘气，血热脸红”。

事后询问，该报道请示过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

“急得心里怦怦跳，不是不让发表吗？消息要是一篇篇出来，我采访的南方谈话内容，就没法写，没机会被人知道了。”

躲进房间，铺开稿纸，陈锡添一挥而就：《东方风来满眼春》，11000字一气呵成。当晚，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审阅完全文，两人决定刊发。

印刷前一晚，陈锡添失眠了。不是怕丢官受处分，而是满心惶恐。“大量引用邓小平的话，弄错了怎么办？”

4天后，文章被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在头版主要位置转载；中央电视台在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

这篇文章，让南方谈话精神传遍全国。社会思想的分歧，像春风吹拂下的冰面，瞬间融化。

客观地说，当时陈锡添发稿还是很冒险的。

“一位中央领导曾问稿子是怎么出来的，说你胆子好大啊。”陈锡添说，“这么重要的稿件，领导不发话，不审稿，当时只能在深圳，别的地方出不来。”

印象里，小平幽默，有时还有些童真，陈锡添也没打算按当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教条，刻板地描写领导人。

“我想把小平同志写成一个慈祥可爱又有人情味的老人。”

42岁的“小记者”

这篇文章的题目，来自唐朝李贺的诗。

还在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时，陈锡添就喜爱李贺的诗歌，现在，他仍能背出“东方风来满眼春，花城柳暗愁杀人”。

而他大学毕业后17年被时代环境敲击成片段的人生，也像极了李贺的困顿寂寥，飘荡悲叹。

今年3月21日，回深圳参加邓小平南方谈话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陈锡添，再去仙湖植物园，当他看到邓小平当年种下的高山榕时，又想起了1983年初到深圳的自己。

1983年10月，已在广州外语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5年的老师陈锡添到深圳旅游。陈锡添到了深圳才发现，这个城市充满了活力和希望。“我被深圳感染了，对这座城市有了很大兴趣，感觉身上好像突然有一股劲，唯一的念头就是要回到新闻本行中去。”

这一年，陈锡添42岁，他又想重新拿起记录新闻的笔。

听说成立仅1年的《深圳特区报》要改为日报，陈锡添觉得那里肯定需要记者。一向沉稳成熟的他，突然涌起一股无法克制的激情，心一横，两手空空冲劲十足地跑去毛遂自荐。

“现在谈理想，年轻人都觉得可笑。但那时候，谈理想是件很严肃正常的事。”

20多年后再谈到当初的冲动，陈锡添说要感谢在那之前，他回母校新会三中的那次经历。当时学校让他作为优秀校友发言，他却一时满腹辛酸。

“从人大毕业15年，与新闻擦身无缘。”那次，自认为一事无成，刚过不惑之年的陈锡添，讲着讲着竟哭起来。

那时，他就下决心要回到理想的道路上去。第三次，也要回去。

陈锡添第一次背离理想，是在1968年分配到湖北日报半年后，被迫去一个农场接受“再教育”，随即像皮球一样被踢到咸宁县一个广播站。

4年后，陈锡添升任东风汽车公司设备修造厂办公室副主任，成了干部身份，生活满足，仕途开始有希望。

但理想的诱惑又在心里萌芽了。没多久，陈锡添辞去行政职务，主动去《二汽建设报》当了一名采访组组长。

第三次，终于实现理想，陈锡添来到深圳，但默默无闻。人到中年才当上“小记者”，报社里满眼都是年轻人。“组长、副主任和主任领导我，他们都比我年轻。”

当年的50多位同学里，有一大半已成为局级干部。有的还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甘肃日报社长、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已过不惑之年的人生，似乎迟春，青春的尾巴也已消失无踪。但42岁的陈锡添觉得，他正变得和这座城市一样年轻。

“没觉得有多焦虑，不自卑也不气馁。”陈锡添是当年报社年纪最大的记者，“感觉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气。”

热情迸发，40多岁的陈锡添骑着自行车开始走街串巷，白天写新闻，晚上写通讯、报告文学，“那时候，真没过多考虑我想要得到什么。”

半年后，他成了副主任；两年后，当上经济部主任；1992年，成为当时深圳仅有的三名高级记者之一。

“比别人起步晚一点，但我走得快一点。”

“疯狂”时代的记录者

2012年的3月，陈锡添去复旦大学作讲座，一位大学生提起了他的文章《不唯上 只唯实》。

“没想到还会有人记得。”陈锡添一时有些吃惊。

促使他写下这篇文章的教训，像是雪白墙壁上的一枚生锈的钉子，一直钉在陈锡添心头。

“1992年8月，深圳市决定以发售认购抽签表的形式发行新股。”陈锡添说，中签者可买1000股新上市股票。

20年前，深圳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都很“疯狂”，“炒股”也是如此。

消息传开后，几十万张身份证被从全国各地带到深圳。发行日一早，板凳、凉席、自行车，甚至是床，都排进100万人的长龙中。

秩序的自我维持充满了中国人的智慧。为了避免有人插队，每个人都紧紧抱住前面的人。以至于一位企业老总略带酸楚地说：我老婆把一个男的抱得那么紧，她从没这样抱过我。

可没想到，很多抽签表被“走后门”拿走了。失落和绝望点燃了排了几十个小时队的股民们。当晚，一些人阻塞了深南中路，烧毁了两辆汽车、四辆摩托车，多名警察被打伤。

这一晚，陈锡添正值夜班。回来的记者讲述了现场的混乱，惨不忍睹。

“市里一位领导审过稿子后，要求加上：发售工作体现了‘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很多场合，陈锡添都没讳言过此事。

可想而知，第二天，报社面对的是100多个“闭着眼睛说瞎话”的愤怒电话，说特区报是“特吹报”。

事后，广东批评深圳“封锁新闻”，中央有关部门下文，对深圳媒体给出四个字评价：文过饰非。

“这四个字，这么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不敢忘啊。”20年后，陈锡添抬起手指，敲敲自己的脑门。

从这个角度看，陈锡添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者。

像深圳特区理直气壮率先开创的全国几十个“第一”一样，1999年，深圳特区报和香港商报合作，开内地报业对香港报业参股改革的第一范例。

已是《深圳特区报》总编辑的陈锡添跨过罗湖桥，出任《香港商报》总编辑。

在深圳生活了十几年的陈锡添，近日参加了改革开放后影响全国的“深圳十大观念”主题活动。30年来，吸引人的不仅仅是深圳的高楼大厦和发财机会。

“观念影响改变了人的命运，自愿来深圳的人都有种理想主义情结，不甘平庸，勇于闯荡。个人和城市是相似的。”

“市场经济方向被指明后，大量机关干部‘下海’，走出体制，这是时代的需要。这种生活，完全和以前的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的机关生活不一样。”陈锡添自己有过深刻的体会，“社会思想分歧的解决，为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制度保障。”

不只是机关干部，还有像“爱国者”品牌创始人冯军这样刚毕业拿到“铁饭碗”的大学生，也“下海”了，到中关村去蹬三轮，当了个体户。

那年3月，远在黑龙江省穆棱县的县政协副主席蒋开儒逐字逐行地读完了《东方风来满眼春》。

然后，他郑重地对妻子说：“我要去深圳了。”

带着凑来的2000元钱和“总会有活路”的决心，蒋开儒坐了几天几夜的硬座，来到深圳。

眼前巨大的反差让蒋开儒震惊而恍惚，他怀疑自己到了香港。13年前还到处是稻田的深圳，如今已是高楼林立，“深圳”两个字，在黑夜的霓虹灯牌上闪亮。

这一年，蒋开儒57岁，临近退休，和很多人一样，他们从全国各地跑到深圳寻找奇迹。

这一年，所见所闻让蒋开儒激动无比，充满热情地写下了一首歌词——《春天的故事》……

“应该像1992年那样大胆改革”

本报记者 任鹏

记者：今年，从中央到地方再到民间，大家都在纪念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您认为在这个节点上纪念，出于一种什么需求？

陈锡添：20年来，中国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上，忽视了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很多地方以不同形式来纪念小平南方讲话，这是因为有改革的迫切需要和现实需求。现在又到一个坎上了，应该像1992年那样，用敢闯、敢试的精神，大胆改革旧传统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记者：政治体制改革比较复杂，您认为突破口在什么地方？

陈锡添：我们要承认，当前社会矛盾凸显，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丛生，种种弊病就是源于改革的滞后，不配套。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逐步实行，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下，挑选一些突破口来推进。比如改变政府职能，加强法治建设，加强监督机制，另外在选举方面可以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

记者：可当下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与20年前并不相同。

陈锡添：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现在又好像回到1992年以前遇到的各种问题。对于改革，各方面有不同的意见，所以要从南方谈话中吸取勇气、底气，凝聚改革的共识，重振改革的勇气，这是当前最急迫需要的动力。

记者：可以说，当年获得采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机会，是您人生最大的机遇，20年后，您再回头看那段经历，是种什么感受？

陈锡添：我42岁才当记者，但我没感到焦虑，不自卑不气馁，唯有努力工作、尽力追赶。这是个理想化的决定，没有掺杂过多物质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正是因为对理想的追求加上个人的努力，我才发展得比较快。所以，有时候，我们应该对过程多执著一些，不要过多考虑我想要达到什么目标，收获就会自然而来。

一个90后女孩的“非雷锋式”梦想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23天，200元变30万元，一对银戒指换来一座“梦想小学”。
这不是一个童话，虽然很多人认为，这只可能是一个童话。
把童话变为现实的人叫杨艾菁，贵州民族学院一名普通大三学生。
可刚刚走出童话世界的杨艾菁发现，她现在正置身于一个完全真实的成人世界。一些烦恼、困惑也随之而来。她只能说，“我没有在搞慈善，也不是学雷锋。‘异想天开’只不过是90后的一种思维方式，但假如给我一个支点，90后真的可以撬起地球。

90后小女生突发奇想

贵阳，4月3日。

小十字广场。

“如果现在听到有人说，他有一个梦想，我肯定会支持他。但如果我有30万，我不会马上对他说，‘好吧，我给你’。”

刚刚梦想成真的1991年出生的女孩杨艾菁在换位思考后，突然变得保守了。她说，如果帮助一个人，她会考察很多条件。但在两个月前，当她通过微博向全世界发出自己“用一对银戒指交换教学楼”的梦想时，她只拥有那个梦想。

梦想的起点要从搞“以物易物”活动的“原”咖啡屋说起。杨艾菁以前并不是这家咖啡屋的常客，直到去年11月那个“以物易物”活动开始。空乘专业的她有着很好的身材，却一点没有做空姐的打算。独立、开放、纯真、敏感，她说，90后的4个性格特点，她都有。

最初，拿着一对银戒指的杨艾菁并不打算与别人交换什么物件，而是在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结束后，她想用爱情“遗物”——一对价值200元的银戒指，换别人一个动人的故事。可没有故事能打动她。

激动人心的转折发生在一个从未谋面，而以后也不需要联系的男人身上。去年11月底的一天，这个男人的故事打动了杨艾菁，但是她没有送出戒指，而是得到了一个看上去极不靠谱的使命，男人希望她用戒指去跟别人交换回一栋教学楼。

今年2月1日，杨艾菁把自己“用银戒指换教学楼”的想法发到微博上：“我想用一对戒指为贵州山区的孩子换一栋教学楼。希望朋友们能帮忙宣传和参与交换，把它变成我们大家共同的梦想，并一起实现它！”

“她就是想到就做，90后的小女生嘛。”老板娘曹春梅笑着说，小杨不是那种思维很缜密的女生，而是突发奇想，然后就开始做了，事先绝对没有任何计划。

教学楼建在哪里，需要多少钱，怎么换，想要换什么，如何实现……

当后来那位出资30万元的上海神秘网友连珠炮似的抛出一连串问题时，杨艾菁招架不住了。

“我就拿本子记呀记呀，最后我说：‘你等着，我回头都落实了，给你电话’。”

“每一天都是奇迹”

2月5日，“戒指换教学楼”终于迈出第一步，新疆籍网友“刘堂堂”私信小杨，表示愿意用价值3000元的和田玉，交换她手中的银戒，作为自己的结婚戒指。

贵州省纳雍县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在梦想微博发出4天后，便联系了杨艾菁，希望将来这座用戒指换来的教学楼能落户当地。

2月17日，一条遥远的微信从上海传来，上海工商外国语小学学生赵艺宁愿意拿自己价值1.5万元的钻戒交换和田玉。

而贵州籍演员周显欣得知这个消息后，捐赠了自己的一枚纪念钻戒，杨艾菁一下子收到两枚钻戒，激动得碰掉了许多东西。

2月23日，一位神秘的上海网友终于通过私信联系杨艾菁，愿意出资30万元帮她实现这个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为了将梦想真的变成一座教学楼，2月23日，杨艾菁一个人背着小书包，前往贵州省纳雍县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推荐的夹岩村探访，而这次经历让她难忘。

夹岩村距昆寨乡政府22公里，全村7个村民组，约2000人，有两个教学点，都只招收一年级学生。她发现，那里的学校实在太“不靠谱”了。

对于富裕年代成长的90后，杨艾菁到昆寨后看到的是：学校屋顶漏水，操场上跑鸡鸭，书桌晃晃悠悠，黑板就是黑泥涂在墙上，粉笔写上去也是坑坑洼洼……

“我看了以后很惊讶，觉得这也叫小学吗？这已经是2012年了，再夸张也没有到这一步吧？”

“有一个母亲说，她孩子6岁，个子只比狼高一点，每天天不亮就出门上学，我听了以后非常难过，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杨艾菁当时很激动，随即决定把戒指换来的教学楼落户在夹岩村，并坚持要把这事进行到底。

2月29日，第一笔善款到账后，教学楼就已开始建设。3月8日，杨艾菁生平第一次作为“甲方”与贵州省纳雍县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以及当地教育部门签署建校协议，而这份正式协议的落款除了名字和联系方式外，还有QQ号、邮箱、微博。

那几天，杨艾菁在微博上高兴地抒发着自己的心情：“每一天都是奇迹。”

“我能换到的只有教学楼”

其实，对于自己家乡落后的教育面貌，杨艾菁坦言，以前她只是从电视上略知一二，“但从未关心过”。

但这一次，杨艾菁很认真。

“现在地质勘测、土建都已经开始了，听说已经在挖地基了。”

面对本报记者，杨艾菁在历经两个月梦想实现后，俨然不再像是大学生，而成了一位关注工程进度的开发商，满嘴吐着以前从未冒出过的字眼，而这些都是她最近“速成”的。

直到现在，杨艾菁也觉得一切发生得太快，但她的适应能力却也在惊人地同步增长。

在3月2日的QQ签名中，她写道，“爱，能让人一夜长大。”

杨艾菁告诉记者，其实异想天开和责任之间的距离，在90后看来并不遥远：“如果你愿意为你的异想天开去努力，去拼搏，那就是一种责任。如果你不愿意，那就是你的异想天开。”

但成人世界比起童话世界来，真的是既不美丽，也不浪漫。

在得到神秘网友的资助后，纳雍县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给她的报价是：一所学校，50万。

“整个学校，还包括操场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我说，太多了吧，我说我不要操场什么的，我只要教学楼，我能换到的也只有教学楼，我就给30万，这些附加设施你们自己想办法。”

杨艾菁不解地说，“政府的事情，凭什么让别人全额出款？”

在微信上，经过多次纠结和讨价还价，昆寨乡党委书记李践最后承诺只建教学楼，配套设施他们自行解决。

但是对于这个充满童话色彩的梦想，杨艾菁突然发现，自己的一对戒指“喊破天”，换来的网友爱心还是不能给夹岩村的孩子们一个“完美”的答案。

“类似这样需要建设学校的地方在贵州还有很多，需要更多人去关注，但是实际去做的并不多。”

许多商业机构找到她，说可以以基金或者奖学金的方式捐给贵州山区的学校更多钱，杨艾菁听后一度十分开心。但是后来，她却发现这些机构只是借助她搞宣传而已，钱是不会给的，这只是一个噱头。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说到这里，杨艾菁有些失落。

“我没搞慈善，更不是学雷锋”

因为“戒指换教学楼”的梦想实现，杨艾菁身边的朋友开始向她要签名。而贵州民族学院则指派她参加“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比赛，并在半小时内完成2000字的“梦想”总结。

由于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公布出去，有一天早晨，她被一个陌生男人在电话中叫醒。

“你是杨艾菁吗？”

“我是。”

“我就看一下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人，现在知道了，你睡吧。”

甚至，有一家杂志社也找过来，希望探究杨艾菁那对银戒指背后的爱情纠葛。

出名之前的杨艾菁很安静，喜欢看安妮宝贝、喜欢演员文章，喜欢临摹凡·高，还曾一个下午看完了《金陵十三钗》。

但出了名的杨艾菁却越来越觉得，自己和当初的那个“梦想”都在变味。

“3月初，有人就提出，要把我和雷锋联系在一起。可我和雷锋没关系哎，他是舍己为人，帮助群众。我没这样啊，我只是完成自己的一个梦想，我说的是实话。”

在纪念雷锋活动之后，小杨的“梦想”又成了时下流行的“微公益”的代名词。

“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不接受。”

小杨坚持说，这就是一个“以物易物”的活动而已，只不过她换的东西有些特别，干吗要跟慈善扯上关系？虽然她帮助一个村庄的孩子们建设教学楼，但杨艾菁不觉得自己是在做慈善、学雷锋，相反她反感别人给她“扣帽子”。

但杨艾菁发现，虽然自己说的都是真心话，但别人看待她的方式却没有什么改变。

有媒体曾问起，这次“梦想”实现会对她的人生有多大影响？杨艾菁回答得很简单：在梦想实现前，她会一直坚持下去；当梦想实现后，“大家只是出分力，然后各自回到生活中去。”

当记者再次问及这个问题时，杨艾菁笑着说：“这件事，只能算是我20岁的一个里程碑，让我知道真实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通过这个梦想，她也希望人们理解，当初她的“异想天开”不过是90后的一种超越的思维方式，但假如人们给她一个支点，90后真的可以撬起地球。